



毛泽东思想史

第四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33 章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295)

第一节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
..... (1296)

第二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306)

第三节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捍卫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320)

第 34 章 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333)

第一节 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 (1334)

第二节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341)

第三节 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括及其指导作用的肯定 (1357)

第 35 章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1366)
第一节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367)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分析	(1376)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1389)
第 36 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404)
第一节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1404)
第二节	走效益与速度相统一的发展路子	(1415)
第三节	经济与人口、科技、环境的协调发展	(1431)
第 37 章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1448)
第一节	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	(1450)
第二节	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1458)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1476)
第 38 章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485)
第一节	社会主义要在政治上发展民主	(1486)
第二节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495)
第三节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502)
第四节	政治体制改革	(1511)
第五节	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1518)
第六节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1524)
第 39 章	“一国两制”的构想	(1535)
第一节	和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重大的决策	(1535)
第二节	“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1542)

第33章 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思想受到严重的歪曲和篡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照理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当立即得以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使党的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迟迟未能得到恢复和确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深入人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真正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在这次伟大的战略转变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邓小平不仅较早地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大力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为恢复和发展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杰出贡献。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进行的干扰和破坏,针对少数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坚决地捍卫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捍卫了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清除“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为结束“文革”后两年来的徘徊局面,为实现全党战略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续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

1976年10月,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为了肃清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消除其恶劣影响以拨乱反正,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

针。在1976年10月26日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他强调：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左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说：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年12月25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重申：只准批右，不准批左；强调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稿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接着又指示其写作班子，将这段话加以修饰，改成“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将其写进《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中，于同年2月7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从而形成了“两个凡是”的基本观点。他在同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根据这个观点，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要求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同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发行，他还说贯穿这本书的根本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此清楚地表明，“两个凡是”的观点，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大会在总结揭批林彪、“四人帮”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党在新时期的根

本任务,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大会仍然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肯定了“文革”期间召开的“十大”,认为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还高度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进而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和中共十一大路线的基本内容肯定下来。基于这种观点,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竟然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声称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两个凡是”这一错误方针的影响,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中共十一大没有从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加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采取“冒进”的方针,不顾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等现实的国情,反而错误地认为国民经济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提出了生产上的过高指标和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如提出在“六五”期间工业上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10个大有色金属基地及若干条铁路干线,大港口,等等。这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违背中国现实国情,为中国实际国力所不能承受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文化大革

命”的恶劣影响难以消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难以调动,经济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徘徊的局面。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邓小平较早地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还在 1977 年 2 月,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同年 4 月 10 日,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曾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年 5 月 24 日,他在同当时中央的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进一步分析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①他紧接着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②同年 7 月 21 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从正面阐述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原则问题,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

①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5、36 页。

毛泽东思想。”^①因此,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②从1977年以来邓小平的多次有关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他尖锐地剖析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原理的,是用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造成思想僵化。

第二,他深刻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对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党的各项工作,妨碍极大,对党的事业,损害极大。

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酝酿和展开,正是在坚持“两个凡是”与批判“两个凡是”,割裂或歪曲毛泽东思想与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两种观点进行着尖锐激烈斗争的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这场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而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其酝酿准备可以追溯到1977年冬。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就曾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真理只有一个》的文章,阐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同年4月,《光明日报》收到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教师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稿件,引起了负责

^{①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9、40页。

人重视,予以重点修改,加强了该文的现实针对性,并更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修改后的文章在送给胡耀邦审阅定稿后,于同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该文公开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位置上,新华通讯社同时加以转发。又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这两家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加以转载,由此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从而正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鲜明地提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并明确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文章还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并据此加以阐述,指出任何真理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观点、新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的旧观点、旧结论。因此我们绝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和发展着的革命实践。绝不能认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精神枷锁应当粉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及其论述,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两个凡是”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利用其在中央和中央宣传部门的权力,先是指示主要新闻媒介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要《红旗》杂志不参加这场讨论,要该社负责人“不要怕孤立”;继而又斥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并批评刊登此文新闻单位“不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该单位负责人“没有党性”,甚至认为这样做是“砍旗”、“丢刀子”,是“不

宣传“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要“三、七开”等等，力图通过对这场讨论的斥责、批评和压制，来阻挠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旗帜鲜明地支持并积极参加这场讨论。1978年5月，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这篇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扳不倒的。特别是在同年6月2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正面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人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①。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的这番谈话，实际上是公开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的观点。紧接着他批评了那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忘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只知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原话的错误做法，并对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1930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1936和1937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1941到1942年的一系列整风文献，1945年中共七大的报告，到建国后毛泽东的一系列科学著作和重要讲话，作了简要的回顾，深刻阐明了实事求是与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对立。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针对“两个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09页。

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严肃地提出了“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①的任务。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指出:“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②看来,邓小平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展开后,为了大力支持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他抓住“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其违背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的角度,深刻地揭露了其对毛泽东思想旗帜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其后果是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他还把这场论争,提到继续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大解放的高度,从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在这种形势下,胡耀邦又在中央党校组织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正受到巨大压力,只得把文稿送到《解放军报》,得到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由他亲自审阅定稿,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同年6月14日在该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并有针对性地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对它的种种责难。文章还尖锐地揭露了这些拘守旧口号弊病的人们,除了思想落后于实际这一认识上的原因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这使人们的思想再次受到震动,同样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趁热打铁,胡耀邦紧接着又组织撰写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

①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4、121页。

先刊登于同年9月4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接着于9月6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将该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邓小平上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这三篇理论文章的相继发表，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云、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通过发表文章和讲话，阐发实事求是的传统，宣传真理的实践标准。如1978年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是我们一向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这场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得到理论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在1978年六七月份，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等学术单位，均先后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会后许多学者还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对此加以专门论述。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尤其得到全国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普遍关注和支持。从1978年6月到11月，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中央各部门到各地方党政机关，从解放军各总部到各大军区、省军区，从负责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绝大多数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加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极其广泛的群众运动。截止1978年底，仅中央和省级报刊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专文，就达650多篇，至于各种类型的讨论会则不可胜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

一,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平凡真理,为什么会引起全国上下高度的关注,形成如此规模巨大的广泛讨论,这不仅是因为“文革”十年搞乱了的最基本的理论是非亟待澄清,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讨论关系到冲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从实践中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正确解决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如何看待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和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从而消除“文革”的恶劣影响,结束两年徘徊的局面,使党和国家在经历了巨大灾难之后迅速恢复元气,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这实质上是关系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应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一根本问题。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论的基本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实质,揭露了其在实践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害,从而起到了正本清源,解放思想的作用。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这场大讨论,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打破了长期以来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推动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因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订不出来,制订了也贯彻不下去。他十分感慨地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

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①正是这场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作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唯其如此,全会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全部实践,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科学的结论。

第二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 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一次极其成功的会议。此前,为了给这次全会作好准备,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按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即讨论农业问题和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由于邓小平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政治局决定会议着重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一重大问题。会上,陈云等老同志提出,与重点转移相适应,还应当解决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如要正确解决薄一波、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特别是要解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这些提议,得到会议的大力支持,大家从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76页。

^②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错误,分清是非的目的出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对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主要负责人“两个凡是”的方针,经济工作上的冒进,以及由此造成工作上的停滞和失误提出了严肃批评。强烈要求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以真正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根据大家所提的建议和讨论的问题,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并为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谈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1)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些问题贯串着一个中心思想即实事求是。他把实事求是提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把实事求是同批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联系起来;同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联系起来;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联系起来。并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解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联系起来,其中还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重要问题。因此,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标志着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一、把实事求是提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并对其作了新的概括

邓小平讲话的核心问题,是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此作了新的概括。他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